

气候慈善专栏

大力发展气候慈善 助力构建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

“自2016年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慈善意识更加普及,慈善力量有序增长,慈善服务迅速发展,慈善活动逐步规范,慈善创新日益丰富,慈善功能有效发挥。气候慈善作为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乘着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从小众、探索逐步走向公众、日常,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创新为构建慈善事业新格局作出重要贡献。

■ 本报记者 王勇

“气候慈善不仅填补了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一块结构性空白,为企业提供了把 ESG 从合规义务转化为战略资产的通道,也在重塑中国慈善事业自身。这是国家战略牵引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双向奔赴的结果,善待这股力量就是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储备最柔软也最持久的社会资本。”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执行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监事张强强调。

不断拓宽慈善领域

2016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慈善法,为我国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法治慈善提供了法律依据。在针对困境人群救助之外,“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被确定为慈善活动的一部分。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强调明确把慈善作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2025 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明确要求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这些决策部署,要求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肩负起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传统扶危济困式的慈善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只是这些,满足不了时代对慈善事业的要求,需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为社会力量提供新的投入方向与途径。

气候慈善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在气候慈善力量的探索实践下,越来越多的慈善议题被开发出来。从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适应、减排降碳协同、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到公众宣传倡导、绿色低碳企业推动、行业基础建设、国际交流合作,慈善事业的边界在不断往外拓展。

另一方面,气候慈善项目的创新实践,让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有了更多的方式。除了慈善捐赠之外,还可以贡献专业力量、开展专题研究、

参与志愿服务、从自身做起……

例如,万科公益基金会就推动万科集团以自身办公场景为试验场,深度融入气候议题再将经验转为行动指南、团体标准和物业实施路径,向更多企业扩散;同时把企业家与企业案例带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使企业从捐赠者转为气候解决方案的共同生产者。

“这套路径的关键,不是劝企业‘多捐一点’,而是帮助企业把减碳、减碳和气候责任写进办公运营、物业流程、供应链和战略管理。”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表示。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企业把气候慈善作为战略影响力的一个具体领域,是企业作为出资方权利的体现。相关部门及慈善行业应该为其创造条件,疏通渠道。”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原一级巡视员孙桢表示。

持续壮大慈善力量

与其他领域的基金会偏向直接执行项目不同,资助中小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气候慈善领域的重要工作方法。因此,气候慈善在为慈善事业拓展边界的同时,也为壮大慈善力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统计,2024 年,12 家 CEGA 成员提供了 3.56 亿元环境资助,其中 16%投向“气候变化”;53 家非成员提供了约 57.70 亿元环境资助,其中约 50.04 亿元用于开展“绿色低碳企业推动”类的項目。

2025 年,13 家 CEGA 成员提供了约 3.98 亿元环境资助,其中 18%投向“气候变化”;42 家非成员提供了约 56.34 亿元环境资助,其中约 50.02 亿元用于开展“绿色低碳企业推动”类的項目。

“中国以往的气候行动得到了国际资金支持,并且通过产业发展回馈世界。今后中国的气候行动可能主要依靠国内资金,包括政府和民间资金。与此同时,南南合作也需要来自更多途径的资金,而且气候减缓和适应活动的需求都在增加。气候慈善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孙桢表示。

这些资助并不仅仅用于被资助方实施气候慈善项目,更重要的是支

持陪伴被资助社会组织持续成长。

例如,经过持续探索,万科公益基金会把资助从“给一个项目”升级为“陪一批组织长大”:从社区骨干、初创机构到区域型领袖,形成可持续社区领域的组织成长基础设施。从 2008 年至 2025 年,基金会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超过 10 亿元,资助的机构超过 400 家。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 2018 年启动环保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基金以来,已连续开展八期资助活动,累计资助 67 家(次)环保社会组织,覆盖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立法建议、环境法律普及、政策倡导、社区气候适应与低碳转型等多个领域。

2022 年以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先后实施了碳中和公益传播——社会组织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项目、促进气候和性别领域社会组织发展项目、青年绿色发展项目等,累计支持超过 120 家机构,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能力、内部治理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3 年,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CEGA、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发起了环境公益“新”力量项目,每年选拔和资助具有明确目标和发展潜力的环境公益领域民间组织,并且从第三期开始结合环境公益领域数字化需求发起了“智慧生态共建计划”,与各地枢纽组织、新生环保机构共同探索环境公益行业数字化的可能性。

三年来,项目支持的机构在活动策划执行能力、知识储备、数字化能力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我们的项目属于非限定性资助,所以评审时重点是对社会组织的战略定位、团队能力进行评估,并且关注项目设计的科学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中华环保联合会战略合作部部长倪堇强调。

大胆进行慈善创新

不断拓展的领域,最新创立的项目,让气候慈善机构在工作中大胆创新,为中国慈善事业探索出一系列新的路径与模式。

项目实施方面,万科公益基金会自 2018 年起将“社区废弃物管理”作为旗舰项目,基金会与平安信托设立了以“减少食物损耗与浪费、倡导健



环境资助者网络成员伙伴在 COP30 中国角发布《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与《气候慈善指南》

康饮食”为公益目的的慈善信托;与中国农业大学成立有机循环教授工作站;在大梅沙万科中心园区建立了半自动化黑水虻养殖项目,实现了园区厨余垃圾的 100%就地资源化;在此基础上,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推动项目规模化落地。

“它不是单一设备项目,而是把新型慈善金融工具、大学科研、政府共建、技术试点、公众教育、研究评估和国际交流串成一条从源头减量到末端资源化的完整链路。”谢晓慧强调。

议题推动方面,CEGA 成员机构共同发起的“气候慈善伙伴计划”,以环境资助者协作平台为基础,连接成员伙伴、企业、慈善家、社会组织与国际伙伴,形成“认知提升—资源链接—项目共创”的行动链条。

一是提供系统化知识支撑。梳理气候捐赠案例、编写气候慈善指南、开展国际资金与议题研究,为成员、企业伙伴与慈善家提供判断依据。二是建立资助者社群,通过气候慈善汇、私董会、中外气候慈善交流,帮助资助方熟悉议题、提高认知,形成长期关系。三是影响力项目共创。完善项目库与信息平台,组织项目路演与实地参访,支持伙伴围绕重点议题共创示范项目。四是传播与行业动员。通过沙龙、论坛、媒体合作与国际会议,扩大气候慈善议题的行业影响力与公众可见度。

合作机制方面,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和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行动”资助计划,突破了传统合作方式,通过平等合作和共同决策,形成一致的资助目标和资助模式,统一对外冠名。项目

的伙伴筛选、资金分配等环节均经过充分的沟通和民主投票,确保决策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树立中国慈善形象

气候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应对,也决定了气候慈善天然具有国际属性。致力于气候慈善的机构纷纷走上国际舞台,在解决气候问题的同时,树立了中国慈善力量的国际形象。

一方面,气候慈善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气候慈善机构联动,共同搭建平台、实施项目。

例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以解振华先生捐赠的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奖全部奖金为种子资金成立了振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基金,基金重点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瞻性、创新性、国际性的对话交流、超前研究和试点实践活动,为国内外利益相关方搭建了一个绿色、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平台。

基金还布局中美气候行动对话、中欧气候行动对话、气候变化南南交流与能力建设項目,面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实践经验,探索绿色交通电动化等领域国际合作路径。“我们希望跳出单纯资金捐赠的传统慈善模式,把理念输出、经验共享、能力共建作为中国慈善对外贡献的重要内容,体现中国慈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特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振刚表示。

中国民促会与北京市境外非政府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京林业大学等伙伴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林下经济网络行动:提升森林社区气候与生计韧性项目”。通过线下国际会议、系列跨国线上共学,实现中国与东南亚森林社区、社会组织、学术群体的双向知识流动,把中国林下经济实践对外输出,同时也引入东南亚本土社区森林治理的宝贵经验;跨国的案例交流也帮助参与机构看到现实痛点,启发参与者思考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区生计三者如何协同。

一方面,气候慈善机构积极参与国际会议,传递中国慈善经验,讲述中国慈善故事。

以参与 COP 为例,中国民促会连续 18 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依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资格及国内外伙伴网络,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搭建渠道,推动来自社区一线的气候行动经验进入国际讨论。COP30 期间,中国民促会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和合共生: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民间力量》,全面描绘了一幅从本土实践延伸至多边舞台的“中国民间气候行动图谱”。

“我们参与 COP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项目伙伴共同梳理这些实践,提炼其中的实施方法和社区经验,通过边会、新闻发布会、主题展览、案例材料及国际交流等形式,使国际社会更加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工作。”中国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香奕表示。

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自 2009 年起率中国企业代表持续参与 COP;2013 年基金会开始长期支持中国角等活动,2014 年联合发起 CTeam (2017 年注册成立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国际参与从个人发声与单次活动逐步沉淀为组织化平台。

“基金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的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可复制的中国实践:零废弃博物馆、社区厨余循环、碳中和社区、企业转型和民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谢晓慧强调。

COP 等大会之外,在中国民促会、环境资助者网络等的支持下,中国的社会组织不断走出国门,与各国社会组织进行常态化的深度交流与参访学习。

“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民促会的平台,推动中国慈善领域在绿色发展、性别平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外传递,把民间层面的实践成果纳入全球治理的对话当中,更加客观立体地展现中国慈善的实践积累,树立中国慈善务实、开放、共建共享的国际形象。”王香奕强调。

寻找慈善传统

■ 牟艳 张艳霞

体育义赛是以体育竞赛、表演等形式募集善款,开展公益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定义是“为正义或公益事业筹款而举行的体育比赛”,这一诞生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体育现象,深度融合了社会救济、竞赛表演及社会体育等领域,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有效推动了中国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频发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的催化

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是多重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频发的自然灾害与长期战乱所引发的社会救济需求是其兴起的社會背景。从自然因素来看,晚清及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多种灾害交替甚至同时发生。例如,1917 年,京兆、直隶地区发生特大水灾,1920 年华北五省大面积的旱灾,致使 3500 万百姓沦为灾民;1931 年江淮大水灾及 23 省,灾民数量超过 1 亿。自然灾害让灾民缺乏衣食、被迫流离失所,迫切需要救济。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派系林立,军阀割据混战,战乱不断,社会动荡致民不能安定。特别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致使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民、难童、伤兵救济成为亟待

解决的社会问题。连年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政府财政,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救济能力。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使得传统仓储救济体系崩溃,官方救济能力因财政困顿与行政分散化而严重弱化。由此,近代社会频发的自然灾害、频仍的战事和数以万计需要救济的灾民以及日渐衰弱的政府,成为近代体育义赛兴起的现实背景。

城市化发展与体育竞赛市场的形成

近代城市化发展为体育义赛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城市相对完善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和市民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展创造了条件。自 1917 年上海建成西门公共体育场后,各省也相继修建了一些公共体育场,至 1929 年,各地的体育场已达 1142 个。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西俗东移的影响,城市市民娱乐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在近代中国,体育是新兴事物,体育竞赛更是新的事物,社会人士对于观看体育竞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有不少公务人员同在各机关服务的人士,利用体育活动来解决业余娱乐问题”。“参加体育竞技活动和观看体育比赛成为近代城市民众一项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人们通过观赏体育竞赛获得娱乐休闲满足的同时,也促进了市民娱乐休闲方式由传统

向现代化转型。

此外,城市相对聚集的人口,为体育义赛提供了充足的观众和门票市场。1927 年,郁更生在《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中记载:“社会人士参观运动比赛兴趣之浓厚,去年冬上海举行中西慈善足球比赛时,售票收入,近五千元。他如华南华北每次举行较大有兴趣之比赛时,观众之拥挤,亦出人意料之外。”1930 年春,在香港举行第五届全国分区足球决赛,“观众达一万七千人,为从来未有之盛况”。城市不仅是商人、富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且也是竞技体育精英荟萃和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地。近代城市化发展与市民娱乐方式的转变,有力地促成了近代体育竞赛市场的形成,为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中西慈善方式的创造性融合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慈善理念通过西学书报、国人海外见闻以及传教士与侨民在华开展的慈善实践传入中国。其中 18、19 世纪流行于英国,以“寓善于乐”为理念的慈善义演活动随西风东渐传入中国,为近代中国慈善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参照。租界是西方生活方式、慈善理念展示的窗口。

自 1845 年 11 月英国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租界后,其他列强也纷纷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划定租界。外国人

在租界这一相对独立且特殊的区域内举办慈善义演活动,国人耳濡目染,对慈善理念与方式转变产生影响。据记载:1877 年,上海鹤鸣戏院率先发起“演戏助赈”的慈善义演活动,开启了国人慈善筹款的新模式,并逐渐形成热潮,发展为传统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多种表演形式。

慈善游艺会是一种以游戏、文艺表演为主的综合性游乐活动,主要通过出售入场券以及义卖等方式筹措赈款。与戏剧义演相比,慈善游艺会多样的时间稍晚,但受众广,形式多样。其中,徒手操、武术、击剑、杂技等体育项目是其表演内容。如 1912 年顺直水灾时,天津青年会举办音乐游艺会,“特请美国军队乐队赴场奏乐,并约学界士女各尽义务,有诗歌、击剑等游艺,收入款项悉充义赈”。1921 年 11 月,湖南新化县旅省筹赈会举办菊花游艺大会,内容包括“乒乓球、新式拳术、篮球、围棋、象棋”等,呈现出中西方体育跨文化调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慈善理念相融合,出现了专门以武术表演为内容的国术游艺会。如 1928 年水灾严重,上海市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两团体共同发起“国术游艺赈灾会”;1931 年国术界举办了赈灾筹款游艺会,上海国术馆、精武体育会、上海武学会等社团均积极参加表演,实现了中西方慈善方式的创造性融合,拓展

了“寓善于乐”理念的中国化路径。

竞技水平提升与体育组织的推动

从史料来看,近代体育义赛呈现出项目多元化特点,以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赛马、游泳、马拉松等西方竞技性项目为主。其中,慈善足球赛传入时间最早,社会影响也最大。据《大公报》记载,慈善足球赛最早传入香港。“自 1919 年起,香港足球总会为筹募款项资助欧战残废军人及其遗族教养之用,每年的 11 月 11 日定期举行慈善足球赛,均由文员对抗海陆联军”。1923 年之前,中华队没有队员入选参赛。随着中国近代足球水平迅速提升,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足球明星,为近代足球义赛的兴起创造了机会。1924 年,中华队梁玉堂、李惠堂初次被邀加入比赛,开创了中西联合举办慈善赛事、共同行善的新模式。在此推动下,慈善足球赛迅速向广州、上海、天津等主要口岸城市扩展,并带动了篮球、排球等体育义赛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24 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近代体育义赛的勃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记载,1926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组织和协调下,上海中西足球会“为彼此练习及赞助公益事业起见,发起第一次中西慈善足

球赛……所得券资悉充仁济医院经费(专为华人治病而设)”。据报道,场面异常火爆,“车水马龙殊极一时之盛,小贩车夫无不利市三倍,天文台路一带呈呈热闹气象,总计观众约有七千五百人”。赛后,上海多个慈善团体纷纷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请求再次举行慈善足球赛以募集善款,足见其在民间的社会影响力。后经协商,中华体协决定接受海格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之请,并于 1927 年 1 月在上海棒球场举行上海队与华人混合队的慈善赛,所得券资悉充该院经费。“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及其分会多次组织发起足球、篮球、网球等体育义赛,展现出组织化、规模化的运作能力,构建起体育与社会救济的互动机制,显著提升了近代体育慈善资源的整合效率。

总之,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既源于民国时期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也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市民文化娱乐方式的转变以及近代体育竞赛市场的逐步建立。中西慈善方式与中国传统体育的创造性融合以及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与体育组织的推动等因素,均对体育义赛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转自《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6 年第 2 期,原标题《体育与慈善: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1924—1945),有删减》)